

香港普通話詞匯教學研究

田小琳

普通話是中文的標準口語，普通話詞匯是中文的標準詞匯、規範詞匯。在香港中、小學裏，普通話科和中國語文科是兩門課程。中國語文的課本，除了文言文之外，白話文都是標準的中文樣式，所用詞匯也大多是規範標準的詞匯，只不過教師用廣東話教，將標準的中文書面語用廣東音讀出來。如果學生作文，也一律要求用標準中文的詞語，不能隨意用廣東的方言詞。諸如，「買東西」不能寫成「買嘢」，「沒有」也不能寫成「冇」。

那麼，普通話教材和中國語文教材比較起來，詞語有甚麼兩樣呢？其實應該說沒甚麼兩樣，只不過普通話科是以訓練說和聽普通話的能力為主的，所以教材編寫偏重於口語色彩重的詞語和句式，而它們並非不出現於書面語。因而可以說，中國語文科教的是中文標準的書面語，普通話科教的是中文標準的口語，書面語和口語從來是相輔相成的，是一碼子事，書面語是用文字把語言記錄下來，口語是用口把話說出來，「我手寫我口」不是很形象地說明了二者的關係嗎？

在香港，「我手寫我口」，並不提倡將廣東話寫出來，那要用很多廣東方言字，不是流通的漢字。由這裏就可以知道，普通話的詞匯教學要佔一席之地。廣東話有一套自己的語音系統，也有一套自己的詞匯系統，不是把廣東話的詞語用普通話的音唸出來就是普通話了，還要有一個轉換的過程，以最常用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四方面的一些詞語為例來比較，二者的差異還不小呢！

普通話說「吃」，廣東話說「食」，「吃東西」、「吃飯」，廣東話說「食嘢」、「食飯」。在普通話裏「食」不能獨立成詞，只是一個構詞的語素，和別的語素自由組合成詞，如「食品、食物、糧食、食堂、飲食、冷食」等。普通話說「小吃」的，廣東話叫「小食」。

普通話說「喝」，廣東話說「飲」，「喝水」、「喝茶」，在廣東話裏說「飲水」、「飲茶」，聽起來比較文雅，帶文言色彩和書面色彩多些。在普通話裏，

「飲」不能單用，也是個構詞語素，用於「飲食、飲品、飲酒、熱飲、冷飲」裏，「喝不喝」，不能說「飲不飲」。

普通話說「穿衣」，廣東話說「著衫」，「穿著」、「衣衫」是同義語素構詞，是相應的。普通話說「臥室」，廣東話說「睡房」，「臥」和「睡」同義，「室」和「房」同義。

普通話說「走」，廣東話多說「行」。「你先走」，在廣東話裏要說「你先行」。普通話裏「行」是一個半自由的構詞語素，可用於「行走、人行道、行人」等詞裏，不能獨立成詞。在廣東話裏「走難」一詞中的「走」，還保留了古代漢語的「跑」的意思，「走難」就是「逃難」，「逃」就是「跑」。

以上只是在衣、食、住、行類裏挑幾個詞看看，已經可以看出普通話和廣東話二者的差異。除了日常用語，還有政治、經濟、文化方面詞語的差異，外來詞語的差異，讓我們不能不重視普通話詞語的教學。

對比普通話和廣東話詞語的異同，這是一種具體的詞語教學法，日積月累，舉一反三，增加學生的語感，不失為一種好的教學方法。坊間也有一批書作參考，曾子凡君的多本著作，均有大量實例，可用於編寫教科書、出練習等等。不少教科書都有詞語對比的內容。

對比教學法注重普通話詞語的規範化、標準化，在詞匯教學裏，屬於控制規範較嚴的一類。嚴當然有嚴的好處，學的標準、規範是教學的目標，使學生打下較好的基礎。

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從詞匯本身的新陳代謝看，似乎對它又應該有寬鬆的地方。漢語的詞是開放型的，社會上出現一個新事物，出現一個新概念，詞庫裏就要相應增加新詞，新詞不斷產生，舊詞隨著舊事物的消亡而消亡，其中有的真的成了死詞，有的成了歷史詞語，有的在一定條件下又「死而復生」。這樣一個大循環，在詞語範圍內不停地進行著。哪些詞算是規範的，哪些是不規範的，在這個大循環中，由社會進行約定俗成的抉擇。

普通話的語音系統，雖然也是經百年演變形成的，但在某一段時期，它是相對穩定的。不可能像詞匯那樣，其中一部分總在變化中。從這個宏觀角度看，普通話語音教學要從嚴，聲母、韻母的發音部位、發音方法，聲調的調值、調類，音節的拼法，都要一一講清楚，不可含糊。而詞匯的教學方法，則要從寬一些，因為對那部分動態的詞，要確定它是否規範，還要有一個過程，不能對新詞新語操之過急。有的新詞新語只是一陣風，吹過去不再來；有的新詞新語，在社交場合慢慢安營紮寨，成了規範詞語。

那麼，從寬怎麼個寬法？我想先來舉例說明。在編寫暑期中、小學用的普通話教材裏，我們用了一些香港流通的詞，比如：遊船河、晨運、上班一族、自助旅行、勁歌金曲、八號風球等。以「晨運」來分析，它是由常用語素「晨」和「運」構成的，一看就明白，它是指早上進行的各種運動，在普通話裏還沒有這麼一個高度概括的形容早上進行各種運動的詞。普通話裏常用「鍛鍊」來概括各種運動。「晨運」相當於「早上鍛鍊」，以漢語習慣雙音節的詞來說，「晨運」得分要多些。「遊船河」、「遊車河」都是很形象的說法，指坐船或坐車漫遊觀景，在香港是隨時可以做到的。這類詞用的是通用語素，而普通話詞語中又沒有那麼準確相應的，可以放寬。

暑期普通話教材中，講到交通工具一課，用了「巴士、大巴、空調巴士、隧道巴士、通天巴士、小巴、黃小巴、綠小巴」等。「巴士」是外來詞，普通話中已有「公共汽車」一詞，但「巴士」有它獨特的外來詞色彩，因而可以和「公共汽車」並用。這些外來詞也已進入到北方，成了通用詞語。詞的色彩不同，不能因為有了「公共汽車」就排斥「巴士」。在不同場合可以選用不同修辭色彩的詞。好像「萊賽」、「鐳射」、「激光」可以並存一樣，各有各的風彩。這也是可以放寬的地方。

順便插一個例子，有的老師以為普通話說「西紅柿」、「土豆」，因而不要用「番茄」、「馬鈴薯」，以為後者不是普通話規範詞語。這理解是不全面的。「西紅柿」是口語，「番茄」是學名，不可偏廢。多一個選擇，不是使表達更豐富嗎？「母親」、「媽媽」、「媽」、「娘」是等義詞，詞的色彩不同，不同場合選用該用的詞，那就叫做「得體」，是修辭的最高境界。所以，教學時，要讓學生明白，「西紅柿」、「番茄」；「土豆」、「馬鈴薯」都是可以用的，都是正確的。

香港還流通一批社區詞，是由於香港的社會背景形成的，這類詞只要它是由通用語素按通用構詞法形成的，均可視為普通話詞語。比如：香港的「公屋」、「居屋」、「籠屋」、「屋邨」、「豪宅」的說法，「三號風球」、「八號風球」的說法，「打工仔」、「打工皇帝」、「炒魷魚」的說法，都可用於教學。「打工仔」、「打工妹」已流通全國。

內地的社區詞，香港也在吸收，詞語隨著彼此交流的增多而互相流通，這應視為好現象。比如，香港工商司俞宗怡就說過：「在經濟開放和自由市場的大前提下，港府可做的事情有兩方面，分別為硬件和軟件的配合」。「硬件是指在基建方面下功夫，如道路、港口、機場等；軟件是指人才培育和政府監管運作的機會。」這「硬件」、「軟件」的比喻是從內地學來的。

我認為，從寬掌握普通話詞匯教學，可以使較多的為學生所熟悉的詞語進入教材，學生在學習中感到教材內容親切，反映自己的生活，從而提高學習興趣，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。

從寬是個比喻的說法，是指在規範的前提下，又有靈活掌握的地方，有餘地，對有些詞語的解釋，不是說一不二，但又不是寬大無邊，該嚴格的地方也要嚴格要求。比如，凡以廣東方言字書寫的方言語素所構成的詞，是方言詞，不能進入規範詞語。像嘅、啞、咁、喺、左、嘢、嚟、瞓、冇、唔等等，從寬的原則也不適用於這類詞。以往老師們對這類純方言詞教學中也是從嚴掌握的。

還有不少外來詞，香港用得很習慣，用的時間也很長，但普通話長久以來並不吸收，這是約定俗成的結果，也就不能從寬了。比如，「打波」、「作騷」（作秀），普通話說「打球」、「表演」。「打波」、「作騷」不能和「打球」、「表演」取得並存的地位，只好保留在廣東方言詞吸收的外來詞裏。

詞匯教學要一邊教，一邊摸索好的教學方法。要和詞匯研究聯繫起來，研究是教學的基礎。以香港的詞匯研究聯繫起來，很有自己的特點，我在《香港詞匯研究初探》一文中，介紹了香港在外來詞、粵方言詞、社區詞幾個方面的研究情況。以外來詞來說，香港社區是

漢語外來詞的一個大試驗場，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建立的「外來概念詞詞庫」陸續對外來詞作了深入的、細緻的分析，這些研究成果刊於《詞庫建設通訊》，教學中可加以參考，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。至於普通話詞語和粵方言詞語的對比研究，是普通話教學將這一研究推向深入的，研究成果最多，曾子凡先生的《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》共收詞 8,000 多條，《廣州話·普通話詞語對比研究》又繼續收集了詞 6,000 多條，有 14,000 多條詞語對比材料，是很豐富的語料了。社區詞反映香港社會流通的生動詞語，反映詞語和社會的密切的關係，將這類詞吸收入普通話課本，應該會受到師生的歡迎。教學和研究是互相促進的，教師在教學中也要擔起研究的工作，將自己研究所得放到教學裏，大家共同來探討出一套好的學習方法、教學方法。

總起來看，詞匯教學的難度絕不在語音教學之下。因為詞匯數量大、變化多，六、七千個常用語素、次常用語素，在組詞時排列組合十分自由，可以組成數以萬計的詞語，以中型詞典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來說，收詞五萬條。如果通過普通話詞語教學，通過教師的指點和生在社交場合的運用實踐，學生掌握的詞匯量在 15,000-18,000 個左右，他們用普通話來表情達意就有了堅實的後盾，不會出現「沒詞兒」的情況。

在普通話教學水平不斷提高的時候，最好能把研究的精力分一部分給詞匯教學，也要分一部分給語法教學，使得普通話整體教學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參考書目

1. 曾子凡(1993)：《廣州話·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》；香港三聯書店。
2. 曾子凡(1995)：《廣州話·普通話詞對比研究》；香港普通話研習社。
3. 田小琳(1997)：《香港中文教學和普通話教學論集》；人民教育出版社。
4.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：《詞庫建設通訊》(1-12 期)。
5. 王敏主編(1997)：《董建華和他的治港班底》；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、燕園文化實業有限公司。

作者簡介

田小琳教授，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(文學士)，山東大學中文系(碩士)。田教授長期從事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、教學、教材編寫和編輯出版工作，曾發表了上百篇論文。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，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總編輯，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常務理事，中國語言學會理事，香港中文教育學會副會長。

田教授來港十二年，從事普通話的教學、研究工作，在香港大學兼職任教普通話。主編《普通話》雜誌，編寫普通話教材，著作包括：《語言和語言教學》、《語文和語文教學》、《語法和教學語法》、《現代漢語》、《句群》及《香港中文教學和普通話教學論集》。